

← (上接6版)

不读书,是说我们不能像原来那样死读书,我们要建立一个焕然一新的学科。

王汎森写的《傅斯年》里,讲到为什么傅斯年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心仪的是兰克学派,他是有他的判断的。他从五四开始,是一个造反的学生领袖。他后来跟顾颉刚先生在学术理念上分分合合,他看到顾颉刚的“古史辨”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是有功绩的,但他觉得中国人也应该有一点建设性的东西,不能完全把信仰打掉。他要建立中国新的史学,来支撑中国人的精神,他说要从新的材料开始。

所以这个时候,傅斯年拿了欧洲已经过时的、到20世纪初已经被批判的、以实证为特征的兰克学派,强调第一是材料,第二是材料,第三还是材料。傅斯年领导下建立的中研院史语所,是这样发展而来的,后面一直影响到新中国考古学的定位。我觉

得直到今天,主流的中国考古学还是在傅斯年的延长线上。

但我们看到王汎森写傅斯年在晚年的时候,已经开始反思他当年绝对的材料主义给中国史学带来的问题。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考古学界没有充分看到这个问题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在刘先生生前,人们不能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,就是过分强调材料的唯一性,反对一切的解释。

方辉:现在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也已经超越年代学建构,开始做阐释工作了,也就是从年代学的建构向综合型发展。综合的考古学,第一就是社会考古学,像聚落、环境的研究,这促进了科技考古在我国的发展。另外,在解释的层面上,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应该介入进来,尤其是美术史。美术史这一块是对人类精神领域的认知,这可以说是认知考古的领域。

认知考古探讨的内容包括艺术的起源,人们对色彩、方位、空间、时间的概念,这是刘先生特别有贡献的一个地方。刘先生的文章,其实在很多方面可以启发今天的主流考古学。

刘先生发表的很多文章,都不是在主流的期刊,很多在边边角角的地方,像《中国农史》《农业考古》《文物天地》等,这些当然是还能看到的杂志。因此他在八九十年代很想结集出版自己的文集,但当时出版困难,书稿被几家出版社推来推去,后来还是一个机缘在台湾出的。

“就像还有好多麻袋没有扎口”

郑岩:刘先生的研究是比

较个人化的。作为史学家的个体,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体制、系统、潮流所边缘化的。重新认识刘先生,我们会看到,这位美术史学家对他研究的对象是有温情的,他有情怀,有自己非常敏感的点,这是美术史真正做到最好的时候要有的一个东西。

他有一些极其敏锐的观察。比方说,从大汶口到龙山,薄胎黑陶,也就是所谓的蛋壳陶,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?他说,那个东西就是那时候的原子弹,当时青铜还没有出现,人们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放在那上面,这是整个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最高凝结,所以可以做到最好。

但为什么这样好的黑陶又是昙花一现呢?他解释说,不断挑战极限的技术,违背了陶土本身的性能,所以最后就崩溃了。而青铜出现以后,青铜器做成薄胎的、光亮的,所以你看二里头的青铜器,有薄胎

黑陶的这些特征,但更加坚硬,克服了陶器存在的问题。在这里,你会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训练,他的敏锐,他对材料、工艺的把握,这是一般人没有的。

他不尚空谈,但他一直是有有一个布局、架构的。他常说,我们是“磨珍珠”,一颗一颗地把珍珠磨出来,至于做项链,等你把珍珠磨完了,将来找一条线一穿就行了。这是他的一个比喻。他还有一个比喻是“老鹰逮兔子”,他说我是一只鹰,在天空盘旋,看到目标后一头扎下来,一逮一个准。要看得很宽,就要盘旋,要有大的视野。第三个比喻是,“与其伤其十指,不如断其一指”。第四个是,要“交叉火网打目标”,多重证据,动用各种学科力量,集中来攻击一个东西。

他有很全面的战术,但对于时髦的东西,他保持警惕。

(下转8版) →



刘敦愿在书房



“嗜烟如命”的刘敦愿

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
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
Academia Sinica
P. O. Box 621, Beijing, China

甚大,但全部费用由吕济基金会资助,于月底安全回到北京。

中国办的杂志和出版社不是以营利为目的,而是以好意为之,目的是赚钱而已。先生大著能在台湾出版,版式又如此佳,理应为先生祝贺。深望先生不要停笔,努力写作,多出精良著作,亦人生一大快事。

老伴于一九九三年九月间因肠癌逝世。现二女儿和长子住我家,为我料理家务,并为整理文件。祝

台安

贾兰坡上

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

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
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
Academia Sinica
P. O. Box 621, Beijing, China

敦愿先生:

久未拜晤,时在念中。我新年时曾作了一次医院。身体自觉虽然较好,但两眼因患青光眼病和白内障,视力很差,带上老花镜也不能看报纸,这封信是用放大镜写的。

尽管如此,最近由我的长子苏彰陪同还去了一趟美国。因为美国国家科学院于去年四月选我为外籍院士,今年在华盛顿召开新院士大会。我的美国朋友甚多,花费

1995年5月10日,贾兰坡在收到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的刘敦愿文集《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》后,致信刘敦愿:“深望先生不要停笔,努力写作。多出精良著作,亦人生一大快事。”

台湾版《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》(1994)中错字不少。刘敦愿一一订正,留下“自存修订本”,并制作了一张勘误表,赠出著作时必随书附上。